

丁伟志  
陈  
崧 著

中西  
体用  
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103  
28

90805

# 中西体用之间

——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

丁伟志 陈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丁伟志，陈崧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

ISBN 7-5004-1644-X

I. 中… I. ①丁… ②陈… II. 西方国家-文化-影响  
-中国-清后期 IV. K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566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科技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42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5.00 元

## 内 容 简 介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的问题,历史地形成了晚清文化论坛的议论中心;而以“体”和“用”一类范畴来界定“中学”和“西学”的性能,并依此确立对待两者的基本准则,构成了这一社会剧变时期的新型文化思潮的通行模式。本书分作四个阶段,依次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与交融。

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是本书探讨的主题。本书通过对于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各种文化主张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这一历程的艰难曲折,揭示这场文化剧变中各种文化见解间是非曲直的错综复杂,并从而揭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

## 自序

本来是想不请人作序，自己也不写序的，以免叫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床上叠床、屋上架屋，望而生厌。可是书稿写成后，决心发生动摇，重又落到序跋配套、穿靴戴帽的彀中。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本书采用了《中西体用之间》这一书名，未免有点怪模怪样，不得不先在这里解释几句，告白于读者。

“中西”也者，自然就是副题中所标明的“中西文化”的意思。用晚清通用的语言来说，是叫做“中学”和“西学”，后来才渐渐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叫法。这种借用地区方位或国别来界定不同文明系统的办法，无疑是很不科学的。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但有大片“西方看来是东方，东方看来却是西方”的地区，而且还有大片“西方看来是西方，东方看来却是东方”的球体的另半边。欧洲现在还有些人执意把中国、日本一带叫做“远东”，可是聪明的中国人早已不再把西欧叫做“泰西”了。文化圈和国界并不相同，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多国一种文化，一国多种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这本书沿用“中西文化”的称谓，无非是迁就于约定俗成，图个方便。

“体用”也者，则是指晚清期间，中国知识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最通行的思维定式。当然，在这种定式下，发生过许多认识上的分歧，发生过许多观念上的变化，不过，以“体用”为结合点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却大体上可以看作晚清七十年间中西文化观念的基本形态，或者说晚清中西文化观念的一种突出的时代特征。辛亥前夕，思想文化界不大使用这类用语了，但是每当论及中西文

化关系时,思想深处仍往往跳不出“体用本末”的窠臼。总之,采用《中西体用之间》的书名,只是试图以较为简明的形式标识出晚清中西文化观念演进的特色而已。

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序。

作 者

1994年5月

# 目 录

自 序	(1)
引 论	(1)
<b>第一章 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b>	(9)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趋向与转机	(10)
清代前期文化的发展及其病态	(10)
“经世致用”学风的再兴	(13)
二 “制夷”——“悉夷”——“师夷”思路的 形成及其引起的文化变局	(18)
一种新的时代自觉:必须“洞悉夷情”	(19)
打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闸门:“师夷长技”	(25)
<b>第二章 洋务自强运动引发的中学西学之争</b>	(39)
一 采西学、办洋务、谋自强思潮之初兴	(41)
洋务乍起和对外认识的新纷争	(42)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谋自强的宣言书	(48)
二 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 馆之争”	(62)
“师夷长技”说的付诸实践和“变通自强”论 的形成	(63)
同文馆的创立和西学教育的启动	(70)
最高决策层的中学西学之争	(78)

三	中西文化观念的又一次直接交锋——“海防 之议”……………	(91)
	“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	(93)
	关于“洋学”的再评估和再论争……………	(104)
四	洋务盛衰中的“重商富民”思潮……………	(113)
	学习西方文明重点之转移——“重商 富民”思潮的勃起……………	(115)
	改革经济制度主张的提出和对洋务成效 的检讨……………	(129)
五	洋务运动中诞生的独特文化观——“中体 西用”论……………	(139)
	洋务派鼓吹的“西学中源”论及其得失短长……………	(143)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155)
<b>第三章</b>	<b>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之兴起</b> ……………	(174)
一	一个新学派的崛起……………	(175)
	一种新的危机意识的形成……………	(176)
	一种新政见：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之美法……………	(184)
二	“新学”的渊源和“新学”的实质……………	(189)
	“残明遗献思想复活”之谜……………	(192)
	近代“西学”与康梁“新学”……………	(197)
	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	(203)
	“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	(213)
三	“新学”崛起引发的文化大论战……………	(224)
	极端守旧派之“卫圣教”、“辟异端”……………	(226)
	“中体西用”论的演化与变态……………	(240)
	崇尚自由民主的激进文化观的出现……………	(257)
	守旧势力的短暂得势和文化复旧的穷途末路……………	(272)



<b>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十年文化观念的演变</b> ·····	(276)
一 海外志士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新观察和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新剖析·····	(277)
文化观念的划时代更新;民权观念的勃兴·····	(278)
民权观念促成的文化自省·····	(287)
二 清末“新政”与如何对待西学之争的复起·····	(299)
清末“新政”条件下出现的文化新局和文化新论·····	(301)
为造就新国民而倡建新文化·····	(313)
三 革命与改良的政治论战引发的文化观念的新分化和新变异·····	(329)
民族革命与民权革命并起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331)
国粹主义的兴起·····	(341)
改良派文化观念的转向·····	(356)
民主主义文化观念体系的创建·····	(372)
活跃于一时的文化虚无主义·····	(384)
新文化高潮的萌动·····	(391)
<b>余 论 漫议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b> ·····	(394)
<b>后 记</b> ·····	(413)
<b>附录 参考文献要目</b> ·····	(415)

## 引 论

文化的创造不能靠简单地依傍与袭取他种文化,但是文化的创造也不能离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孤立进行。文化交流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无从避免的文化现象,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加速剂,新文化出世的催生剂。就人类的几大主要文化系统来看,它们之所以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之所以具有恒久不熄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妥善处理了文化的延续与更新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妥善处理了阐扬本生文化与汲取外来文化的关系。一切优秀的、含蕴丰富、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无不是包容性很强,汲取和消融外来文化能力很强的文化。绝对排他的文化,总不免逐步萎缩衰落。交流,自然不是取而代之,不是尽弃所有,更不是原封趸进,生吞活剥,而是一个优化选择的过程。攻玉之石,补短之长,广采博纳,其效益自是创造劳动的节约、智慧积累的便捷。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很久远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伴随着文化交流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赓续、独立创造的伟业,它的独创性成果是无可取代的。考古学的发掘,已经证明中国原始文化西来说毫无根据。但是,中华文化的创造,并不是在与世界上各种文化绝缘的情形下孤立进行的,它的内容并不是绝对的土生土长的土产。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成是两三千多年前古圣先贤创造的、一成不变的、纯本土的封闭的文化,乃至是单纯的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这完全是陋儒之见。不断汲取并融合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之变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才使得

中华文化的内容不断充实,才使得中华文化因新文化成分的纳入而引发出不断创新的活力。

梁启超早年,把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看作是业经历史验明的公理加以充分肯定,并且为近世中西文化交流高唱过一曲赞歌。他写道:“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sup>①</sup>把今日全球文明简括为中西两大文明,当然是失之偏狭,但是梁启超这段话的确生动地体现着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满腔热情,以及对于汲取和融会西方文化具有充分自信的气魄。

柳诒徵则更进一步以中外文化间的两次大“接触”为界石,把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二是“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三是“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sup>②</sup>这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分期。中古和近世两次大规模地引进与融合外来文化的大潮,在中华文化史上确有划时代之性质,每次都促使中华文化开拓出新局面,展现出新特质,进入了新时代。所以,体现文化交流在中华文化形成中所发生之重要作用的这种文化三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

---

<sup>①</sup>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sup>②</sup> 《中国文化史》(上),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页。

际的。但是，此说亦有缺陷，最突出的就是，说第一时期中“吾民族本其创造之力”而“构成独立之文化”，却没有看到这种“独立之文化”，也是伴随着长期的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而构成的。事实上，在佛教文化输入之前，我国先民生息蕃衍的这块东亚大地上，早已形成规模宏大的、为当世罕匹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从今天的立脚点来看，应当列为中国国内的或中华民族的各部分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在古代历史上的当世来说，则不仅呈现为地域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呈现为部落之间、部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华民族“独立的”或“固有的”文化，无疑是在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不仅如此，南亚、中亚与东亚间的文化交流，欧亚间的文化交流，在佛教东来以前也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交流的方式较为间接，产生的影响也不像华夏文化与佛教文化间的交流那样巨大而已。

深入一步考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其交流势态和交流性能，都存在着实质性差异。姑以柳氏划定的三时期分别考察，可以看出，第一时期中，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远远高出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因此其间的交流自是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吸引并同化周边诸文化的形态，周边诸文化只是以较为次要的或局部的补充成分，汇入华夏文化的大流中。这种交流中的主流支流之别是很分明的，华夏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自然也呈现着这种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和主导性。进入第二时期，文化交流的势态形成新变局，作为交流双方的文化的质量与规模，已呈均势。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固有文化自东汉已渐趋式微，不复有先秦之朝气，亦不复有西汉前期之盛势，文坛沉寂，思想僵直，学术衰枯，亟待更张；另一方面南亚次大陆传来的佛教文化，是自成系统、内容丰盈、思辨精深、文采灿然的一支文化，它与中华固有文化相较，长短各具，难言伯仲。因此，这个时期文化交流的主要两大系统——华夏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除却内容的差异之外，让人们所感到的，已经难以说是两种不同水平文化的高下之分，而是生于本土

和来自域外的两种不同来源文化的主宾之别。这样一场均势的排山倒海般的文化交流，其规模其影响，远非前一时期那样不引人注目的涓涓细流般的文化交流所可比拟了。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华文化的震撼是空前的，引起的冲突与变化也是空前的。这种交流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不仅是重大的全面的，而且从总体上说也是积极的。中华文化确因汲取、消化佛教文化，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崭新的繁荣期。可以说，与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当然这中间始终伴随着抵牾），改造了中华文化；同时也创造性地改造了佛教文化自身，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的输入，影响固然巨大，但是它毕竟并没有构成对本土文化的致命威胁。中华固有文化以其雄厚的积累和生长于本土的传统优势，在和佛教文化交流中仍保持住了主导的地位，因之经过汲取佛教文化的精华而创新的文化，仍是中华固有文化的延续。它的民族的、地域的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佛教文化没有取中华文化而代之；中华文化没有因大量吸收佛教文化，而完全佛教化、南亚化。这是一场取长补短式的互补的文化交流，虽然其间也发生过几个回合的冲突与拼斗，但总归是达到了人类文化史上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间的水乳交融般的和谐。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而言，汲取佛教文化，并以之充实和改革中华文化，不仅不是耻辱的一页，相反地它恰恰是具有博大的包容精神和不息的创新精神的中华文化，进入了一个灿烂绚丽的文化新时期的里程碑。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对迟滞，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阶段。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特征，主要是：

第一，欧洲（或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暂不论），这时已经不仅是两种具有不同传统、不同特色、不同长短的文化，而且是形成一为先进、一为落后的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化。文化交流的均势与平等的格局，

被打破了。中华民族一向自信自尊的文化心态，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中华民族在这个新时期的文化交流中，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不简单是从外来文化中取彼所长以补己所短，而是要在与一个比自身固有文化先进得多的文化打交道中，观察和解决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兴衰存亡问题，要外来先进文化的压力与威胁的境遇中，寻求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

第二，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寻求世界市场，进而掠取殖民地的向外扩展的需要展开的。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交流，不仅势头之猛、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而且从开始就与之俱生地伴随着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侵略与被侵略的行为与事件。在交流中，作为先进一方，是主动的，进攻性的，以改造对方使之适应于自己的需求为目的的；而作为落后的一方，则是被动的，防卫性的，以寻求摆脱困境、振衰起颓的出路为目的的。近代中国正是作为落后的一方，面对这场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如果说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的初步交流，还没有构成这种格局的鲜明特色，当时的有限的交流还较为平和、没有震撼国家民族的大局的话，那么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华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却迅速地陷进面对列强侵略的时代危机。新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势，对中国一方所提出的时代大课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尽管早期的先进人士对于这个时代课题仍然认识相当模糊，然而历史的实际进程却无情地表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方面，所要回答的，就是“如何才能振兴中华”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与以前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不同，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了强烈而严峻的政治性质，这就是说，要回答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或新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大问题。文化交流已远远突破狭义文化的圈子（哲学的、科学的、宗教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主要着眼点已经转移到考察并解决社会制度问题这个层次上。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形成的关于中西文化的持久探索，其实质几乎可以说是一场政治讨论，一场关于社会

制度之选择的讨论，一场关于中国国家和民族命运之抉择的讨论。正因为这样，这场由此起彼伏的若干次具体论争组成的关于文化观念的长期探索，不仅反映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苦难与进步，而且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现代化的进程，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这个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更具有超越国界的国际活动的性质。前此的外来文化，比如佛学，一旦传入中国之后，这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就一变而成为一国范围内的文化活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例如佛与儒，都同等地成为同一个国家内文化舞台上的不同角色、不同流派。外来文化从此便是以一种中国学派或中国教派的身份而存在，它已“割断了”联系它和母体的脐带。它不代表任何外国势力，不反映任何外国利益集团的需求，因而它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演出并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操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工业化急剧发展的进程，“世界缩小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变为纯粹国内文化活动的现象，已经日趋稀少；外来文化变成国内某一流派或者某些流派的事，自然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它往往与外国的文化流派之间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此其一。其二，外国势力从其实际利益的要求或从其文化观念的要求出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其三，中外文化交流此时已时刻受着国际局势的直接影响。十六、十七世纪间，耶稣会士东来后仍受其教廷遥控，固然有宗教上的原因，但已可以看出这隐然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世界市场的需求相关。至于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流所具有的国际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则已直露无遗。如果说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两种既成的定型的文化体系间相对平静而持恒的切磋琢磨、汲补吐纳，那么，近世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变成急剧动荡的国际局势所左右的、瞬息万变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总之，日趋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大势，以及飞速进步的交通通讯以及各种传播媒介，已

使中西文化交流，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循着世界潮流而灵敏变动的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现象。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没有构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交流只局限在上层极少数有识之士的小圈子里，交流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它的历史地位只能说是近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导、序幕，——可惜的是，帷幕落后，几近二百年，才又拉起！真正成为时代风潮的近世中西文化交流，自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事。这一百五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恰恰又是历史地形成了三个阶段：一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到清朝灭亡的阶段；二是辛亥革命成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阶段；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段。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把中国近世文化史划分作这样三个阶段，根据是充分的。一百五十年的中国文化史，在其依次经历的三个阶段上，文化交流的性质，各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当然，段落间必定会存在着许多交叉。

从以改良的方式图谋富国强兵为时代主题，发展到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彻底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为时代主题，再发展到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为时代主题，这是一百五十年间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探讨和论争，始终是环绕着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着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时代主题展开的。

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的进程，这是中国文化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表明，这一进程，不是一支平稳和谐的协奏曲，而是一场纷争不绝、辩难不已的持久的文化讨论。一个内容博大、体系自成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面对陌生的西方近代文化，自然免不得表现出传统所必备的保守性格和排他性格，加之两百年来闭关锁国，更使得社会心态上对外来文化输入引起的事实后果，以及对固有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效用，多所考虑。当然，人们的实际感受千差万别，对待文化交流的态度也自然识见不一。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政坛上各种力量的消长起伏，以及



各种国际势力在华的利益得失，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近世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必然引发一场内容繁复、头绪驳杂并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观念的探讨与选择。

历时一百五十年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探讨和争辩的历史，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凝聚地反映着近世以来中国社会、中国政局和中国文化经历的历程和走向，正因此，研究一百五十年来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史，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提供深刻而亲切的历史借鉴。今天回首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发生的这样一场跨世纪的文化探索，愈加可以看清那时关于文化学术领域中的是非曲直之辨析，对于当时实际行进中的中国之命运，和以后的中国之命运，影响实属巨大。